

《歐美研究》第三十九卷第三期 (民國九十八年九月), 413-454  
http://euramerica.ea.sinica.edu.tw/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W 島的運動寓言與／或童年回憶

許綺玲

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  
32001 桃園縣中壢市五權里 2 鄰中南路 300 號  
E-mail: severina@cc.ncu.edu.tw

### 摘要

法國猶太裔作家培瑞克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自傳《W 或童年回憶》異於傳統作法，以雙軸故事交錯並進，一邊描述兒時殘破記憶，一邊仿探險小說，虛構了 W 運動島傳奇。本論文旨在說明「虛構」的 W 故事對於這部自傳的重要性：首先探究書寫本身如何鬆動文類定位，超越自傳、浩劫文學與回憶錄之一般定義框架。其次，解釋「運動」的主題如何作為貫穿歷史的寓言，並借此主題，作者指涉自身曾經活過，但原不認識的時代歷史，以一則寓言多重影射，並連接當代時事。在戰後新思潮提供的批判觀點下，作者得以反省、整合個人小史與大歷史，使作品中的「真實」與「虛構」產生重重迴響。

**關鍵詞：**回憶、(反／非／新) 自傳、二次大戰、集中營、運動和體育

---

投稿日期：97.1.31；接受刊登日期：97.10.8；最後修訂日期：97.11.2  
責任校對：林鈺婷、蔡青嫻、張滌之

這本書包括兩篇輪流出現的文章；乍看兩者幾乎沒有共通之處，但卻是不可抽離地錯綜交織著，好像任一者少了另一者皆無以自立，也彷彿唯有靠兩者的相遇，從彼此遠遠相互投射的光線中，才能顯露出缺此或缺彼都將無以盡述的，也唯有在這微弱的交集當中才能顯現出來的。<sup>1</sup>

## 壹、前言

法國籍波蘭猶太裔作家培瑞克 (Georges Perec, 1936-1982) 的作品《W或童年回憶》(*W ou le Souvenir d'Enfance*) 出版於一九七五年。這部另類的自傳，最明顯的特色，是在結構上由「虛構」與「真實」兩個故事所組成，以單、雙號章節交錯並進，並以兩種不同的字體分別呈現，全書共分兩章三十七小節。簡述該書內容如下：「真實」部分的背景是在二次大戰前後。德法雙方才剛開戰，培瑞克的父親自願從軍，旋即因傷重，死於戰場。母親將幼小的培瑞克託付給紅十字會人員送往南方，自己仍留在巴黎工作。但不久她也遭到逮捕，一去不回，可能就在送往集中營的途中遇難。文中培瑞克夾敘夾評，試圖重整這段時日的回憶。第一章介紹家世背景及戰前回憶；第二章則捕捉避居於南方的生活點滴。故事結束於戰後初年，已成了孤兒的培瑞克隨姑丈一家重返巴黎生活。「虛構」的部分也分成兩章或兩大階段，第一階段仿歷險小說起頭的模式，主人翁以第一人稱觀點述說自己如何捲入了一趟離奇的探險，<sup>2</sup>

<sup>1</sup> 本段引文取自培瑞克自己為《W或童年回憶》(*W ou le Souvenir d'Enfance*) 撰寫的書背作品簡介 (Prière d'insérer)。這段文字經常為評論者所引用，普遍視為理解其作品的重要指引。因現今台灣並未出版任何培瑞克著作的中譯版，本論文所有引用其著作的段落均為筆者自譯。

<sup>2</sup> 歷險故事的主人翁曾是逃兵，透過一家慈善機構得以借用一名男童的姓名 (Gaspar Winckler) 獲得重生。此行的目的就是受託去找尋這名男童的下落。這名孩童又聾又啞，患有自閉症，其母親 (富有的聲樂家) 專程帶他搭船出洋，為了尋找足以開

一再強調那場經歷不堪回首；敘事者回溯自己決定啓程，這時故事跳接第二階段，<sup>3</sup> 豈料他卻從此消聲匿跡，僅出現一個令讀者無以確認的聲音，詳實地介紹一座名叫W的孤島。這座與世隔絕的島以體育競賽為所有居民的生活重心，以現代奧運理想為唯一的目標，依此建立其行政組織，訂定統治人民的法規。然而，極端的理性科學主義一旦服務於集權統治，便形成了嚴密無比的高壓監控系統；W島經過無比詳盡的介紹後，逐漸顯露的是控制該島的殘酷惡法與處處違反人性的荒唐政策。<sup>4</sup>

---

啟孩童心智的經驗，卻在靠近南美洲尾端的一座孤島附近遇上船難，全體船員及孩童的母親皆不幸喪生，卻唯獨不見孩童蹤影。

<sup>3</sup> 在兩大章之間，留有一空白頁，僅懸著(…)的標點符號，依照一般用法乃指示「此處有所省略」，然而省略的情節為何，則自始至終未曾交待，成為永遠的懸疑。W島故事原先曾以期刊連載小說獨自發表(見註10說明)，兩個版本相較，最大的不同點就在於這個「省略」：原來的連載版本，敘事者以後設介入的方式，要求讀者「忘卻」第一階段所曾讀過的所有內容，以準備進入一個全新的局面。不過，縱然有這樣的聲明，但是從出發到進入島上，過程之間所發生的事皆無任何說明，且從此無論尋人者或要尋找的對象，都失去了蹤影。這樣的安排成功地引發了讀者的恐慌感，失卻了任何可掌握與預期的座標，學者咸認此為培瑞克殘酷美學的具體表現之一。

<sup>4</sup> 簡述W島的分章內容如下：XII 地理位置；奧林匹克國度創建史；立國精神之確立。XIV 居民構成；行政區劃分；大小運動比賽制度(進階層級、競賽項目、日程表)。XVI 競賽項目詳介；分區編制、人數；人員調度的配套措施。XVIII 運動精神(志在必得、為生存而戰鬥)；勝者的待遇與敗者的下場。XX 榮譽封號制(以勝敗成績決定)；人數之限額分配。XXII 法規的嚴酷(包括不透明、不公平、差別待遇等原則)以及法規的不可預測性。XXIV 島上運動員的心態分析。XXVI 女性的生活與義務(孕育下一代優種)；搶姦賽決定生育權。XXVIII 搶姦賽的表演可看性；個人及集體合法或非法的奪標戰略(包含被默許的作弊)。XXX 運動員的童年生活(隔離與夢想)；「菜鳥」集訓；運動員無法逃避的終生考驗。XXXII 運動員年資計算法；高下階層的權力互動；非永久性的「師兄弟」特權制與「保護制」(從屬、壓榨)。XXXIV 運動員的退休出路：轉任公務員(名額極有限)；法規的相互牽制性。XXXVI 運動員無任何生命自主權，敗者無任何生活保障；一切只靠努力求勝(但求勝絕不在一己)；慘不忍睹的競賽成績。

這本自傳的「真實」部分，主要記載的是敘事者十歲之前稚齡幼童的回憶，多的是些微不足道的記憶景象，更留有諸多缺漏、推想、不確定性與反覆矛盾。然而，予人印象深刻的正是敘事者坦然面對回憶的態度。他以後設語言表明殘存記憶的破碎形象，仔細述說了努力求證的經過，卻只能接受種種存疑，把存疑也據實寫下，並未強加合理化：這是這本自傳在敘事方面的一大特色。<sup>5</sup> 不過，若是以故事內容來看，我們不難在其中找到「童年敘事」文類常見的一些事件範式。故事大致上也符合二十世紀童年敘事中常見的「戰時（後方）孤兒」的模式，其經歷可歸入一般常有的事例範圍之內，並無出人意表的情事可言。相對於此，在內容方面更為引人好奇的是「虛構」的歷險小說，尤其是第二大段出現的W孤立島國，猶令人深感困惑。這個部分與「真實」自傳的內容看似屬於兩個各自獨立的世界、兩個截然不同的故事，但是兩者卻在章節編號上順連，輪流交替出現。讀者若不跳過任一章節，順序閱讀下來，難免要心生疑惑：到底兩者的關聯何在？有何必要作此安排？作者希望將讀者從這一路困惑而不安的閱讀中，引向何方？其中的閱讀契約如何締定？「虛構」部分的重要性究竟何在？作者是否仍依循「自傳」固有的目的，試圖在這不尋常的文本組織中確立或追尋某種「生命意義」？其意涵又植基於什麼觀點立場？這些應是這本自傳必然會激發的根本問題。

台灣（文）學界現今對培瑞克的作品及其研究仍相當陌生，但筆者無法在此一一列舉有關這本自傳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在這篇

---

<sup>5</sup> 關於這本自傳「真實」部分的書寫特色、該書的文稿研究，以及精神分析角度的分析，已有太多相關的論文研究，筆者無法在此一一贅敘，從培瑞克專屬網站（Association Georges Perec）或其專研書刊 *Cahiers Georges Perec* 等可查詢到歷年來豐富的研究成果。

論文的題旨之下，僅就「虛構」的安排，針對以上的問題做簡賅的釐清。由於「虛構」部分的介入，打亂了「自傳」文類的封閉性，因此，在「生命書寫」的議題之下，筆者將首先探討這本「自傳」跨越文類的嘗試，而這將會牽涉到主導本書創作年代的文學觀，以及培瑞克的回應方式。但是雙軸結構的選定，應先從作者的書寫動機談起：培瑞克童年遇上戰事，不知何時失去了母親，更不知戰爭為何而來，卻改變了他的人生，而其改變是緩慢而持久的，要在往後許多年的歲月中去認識、內化、自滌、超脫。這樣的困惑與傷慟事實上是經歷過那段戰事而成長的無數法國人所共有的經驗，而培瑞克為了處理這個既屬於他個人又和特定群體共通的經驗，曾苦思各種述說的可能方式。不可忽略的是，一向自我界定為社會觀察者的培瑞克，<sup>6</sup> 關切的絕非僅止於「文學性」或文學的內在自主性問題而已。在他所有書寫個人生命的著作裡，他總是以他慣有的含蓄方式，從微觀視角去呈顯歷史，但是面對這段童年回憶，那遠超過他個人當時可感知的大時代複雜成因，卻要求他必須宏觀以待：二戰時期猶太族群遭逢的大浩劫，是培瑞克無以規避的歷史包袱，而成年以後，他投入了寫作，決意以國際主義者的立場，超越族群議題，積極控訴二次戰後依然存在於世界各角落的集權專政，以及資本主義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競爭法則。因此，對他而言，如何直接在自身的生命書寫中引進歷史洪流，如何有效地書寫「明擺在那兒的集中營，明擺在那兒的恐怖」(Perec, 1992: 95)，是他身為作家的一大挑戰。換言之，他不能不面對這從生命的角度向寫作提出的

---

<sup>6</sup> 培瑞克長期為若干社會學期刊 (如 *La Cause commune*, *Arguments*) 撰寫評論文章，也曾打算與友人共同發行一份刊物 (訂名為 *La Ligne Générale*) 而未成。他所熟識的當代社會學者包括 Roland Barthes, Henri Lefebvre, Jean Duvignaud, Paul Virilio, Edgar Morin 等。

問題，而其寫作之目的正是回應這攸關生命的問題。如何超越當時文學觀對於生命書寫之見解，如何在個人生命與大歷史之間尋求新的辯證性關係，正是培瑞克在完成《W或童年回憶》之前，必須花費多年時間去解決的難題。對他而言，這不盡然只爲了從書寫中去尋求浩劫餘生者的「心靈滌淨」，<sup>7</sup>或是爲了根本「認識自己」，<sup>8</sup>而毋寧更是爲了讓自己或他人能從寫作與閱讀中去體驗（而不只是了解、重溫或揣摩）歷史真相（Bertelli, 2003）。作者面對與他密切相關的過去，唯經掌握住歷史的原則圖象（schema），並倚之劃定時代經驗的座標，方得以確立個人的自我認識，進而完成自傳追尋人生意義的目的。而他所掌握到的歷史原則圖象，便是借由一則充分發展的「運動島」寓言來具體呈現。下文前三章先討論「虛構」傳奇的由來和作者安排雙結構的動機，並檢視文類問題。自第五章起，將彙整相關史實，以佐證「運動」寓言在此的適切性，同時強調此一寓言的多向歷史指涉；第六章則說明運動島的書寫風格及其美學效果。

## 貳、我的童年故事／我的童年故事之一

他的一生不再是他的種種故事／寓言的源頭，而是與他的作

<sup>7</sup> Danièle Sallenave 拒斥所有再現大屠殺的可能性，她認為心靈滌淨的效果是永遠無法在再現之文本生產中達成的（Dana, 1998: 13）。

<sup>8</sup> 「終有一天，我應當開始以文字來卸去現實的假面，以揭露我的真實」（démâsquar le réel pour démasquer ma réalité），引自培瑞克 “Les gnocchis de l’automne ou réponse à quelques questions me concernant”（1990: 73）。“Les gnocchis de l’automne”（直譯：秋天的馬鈴薯麵疙瘩）一詞，其實是從蘇格拉底所言之 gnothi seauton（古希臘文的「認識自己」）而來，培瑞克在此玩文字遊戲，多少有自嘲的意味（Magné, 1999）。

品合力競爭的一則故事／寓言。<sup>9</sup> (Barthes, 1984: 75)

在《W或童年回憶》一書中，「虛構」部分與「真實」回憶之間「乍看兩者並無共通之處」，但並非毫無關聯。虛構與真實，如何成為這部「自傳」的一體兩面？在本書中，作者自行提出了兩個層次的關聯。第一個層次是就「故事世界」(diegese)而言，兩者的關係是「故事中的故事」：W運動島的故事最早源自作者年少時代編造的一則幻想故事，因此自傳是「外層故事」(extradiegese)，W是「內層故事」(intradiegese)。就陳述活動來講，編造「虛構」故事的主體，原先是「真實」世界裡的人物少年「我」，然後是由成年後的人物／作者撰寫發表，<sup>10</sup> 這說明兩則故事出自同一人之手，交集就在於這本自傳的核心人物／作者「我」。<sup>11</sup> 且不強調此事有作者生平現實為真確依據，但更重要的是，作者／敘事者對這點的說明並無故弄玄虛之意，也以此明白地和讀者建立自傳的閱讀契約。以下這段引文出自「真實」部分第一章（即全書第二章，II），作者說明在撰寫自傳的多年前，如何在一個偶然時機，憶起了年少時代的往事：

十三歲那年，我發明、敘述、描繪了一個故事。之後，我把它給忘了。七年前，某天傍晚在威尼斯，我忽然想起這個故事叫作『W』，就某種意義來講若非它就等於我的童年故事，

<sup>9</sup> 原文為：“Sa vie n’est plus l’origine de ses fables, mais une fable concurrente à son oeuvre.”

<sup>10</sup> 同一章裡他提到後來重寫這篇故事，並以連載的方式，於一九六九年九月至一九七〇年八月間，刊登於《文學半月刊》(La Quinzaine Littéraire)(Perec, 1975: 18)。因此，《W或童年回憶》可說是對同一故事的二度引用。亦請參閱本論文註3對兩種版本差異的說明。

<sup>11</sup> 培瑞克在書中的這些創作歷程說明及引述作品的自我指涉，也算是一種「自傳契約」的確立。

至少也是我的童年故事之一。(Perec, 1975: 18)

作者開宗明義，指出 W 故事非同小可，幾乎可視為他的童年故事本身。但是他對此宣告，又有所保留，未立刻說明原因，也沒有讓讀者為接下來的閱讀作好足夠的心理準備，反而任由讀者在進入第二大章的 W 島之後，面對無盡詳述的細節而感到困惑、挫折，甚至迷惘、恐懼。簡言之，閱讀中所引發的恐懼，就彷彿是在揣摩進入集中營空間時所感受到的恐懼。縱然如此，這座島與集中營的關聯並未立即被說穿。緊張感 (tension) 的強度隨著故事進展而漸增，直到最後一章，才由敘事者點出兩個部分的第二層關聯：「虛構」的歷險小說與「真實」交織並進，乃作為註解「真實」童年不可或缺的一則寓言。讀者方才了解寓言的形成，得自於歷史的喬裝與精煉。原來，虛構的 W 不單純是個內層的故事，更是包覆其外層故事（「真實」）的大歷史背景之影射。因此，最末章以間接的方式，似乎帶有類似寓言「教訓」的功能，引全文如下：

#### XXXVII

有好幾年，我畫了好多運動員，身體僵硬，面龐不似人樣；我詳細地描述他們無止息的戰鬥；執著於列出他們一個接一個，沒完沒了的輝煌戰果。

許多年後，我在胡瑟 (David Rousset) 所著的《集中營天地》(*L'Univers Concentrationnaire*) 讀到這段文字：

「集中營的迫害，由兩項基本方針來決定其結構：不工作、光『運動』，不像話的飲食。大多數被囚者並不工作，這意謂再怎麼艱苦的工作，也被認為是件好差事。日程工作要盡量少。『普通』營裡一般會有的苦工，在這裡卻換成一堆日常瑣事，要你做一整天，有時甚至做整晚。其中之一是叫囚犯穿衣脫衣，一天數遍，動作要快不然就有棍棒伺候；或者命他們用跑的進進出出，門口還有**保警用橡膠棒子**來一頓毒



打。小小的長方形水泥地上，專作各種運動：比如揮甩鞭子教人幾個小時不停地打滾；或者安排青蛙跳比賽，動作最慢的會在保警的狂笑聲中被丟進水池裡；或者不斷地快速重複同一動作，如彎下、蹲在腳跟上，兩手垂直；非常快速地（總是快、快、快，**快點，人啊**），<sup>12</sup> 在泥淖中作伏地挺身，肚子要平貼地面，作一百次後，再快跑去淋浴沖洗，然後二十四小時穿著濕透了的衣服。」<sup>13</sup>

\*

不記得為何原因，我十二歲時<sup>14</sup> 選定了火地島來安置我的 W：畢諾榭 (Pinochet) 的法西斯黨徒負責為我的奇想帶來了最終的迴響：現今火地群島的許多小島，已真的變成了集中營。(Perec, 1975: 221-222)

整本書就在此劃下了句點。如此，作者以憶起 W 島的想像為開場，又以 W 島在火地島的現實再現作為結尾，竟未試圖回到他個人的生活，就一般自傳的敘事重點和順序安排來講，這樣的始末並不尋常，可見其意義非凡。結語所造成的迴響，適足以翻轉整個童年回憶的閱讀。上面引文在形式處理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全章分作三個長短不等的段落，涉及三個時間，其間之因果邏輯並未以明確用語連接。這樣似斷似連的分段法，欲言又止，可說是「真實」部分表述的特點之一，與描述 W 島時條理分明、細節充分發展的寫法，相去甚遠。末章在內容方面，也有幾點值得注意：一、作者雖然引用了有關集中營結構的理論原則，也透露了胡瑟的啓示為他早年的運動島奇想賦予了象徵意涵，但自始至終他並未將「納粹」二字明

<sup>12</sup> 引文中的粗體字原文是德文，如「快點，人啊」是 *Schnell, los Mensch*。

<sup>13</sup> 此段引文為培瑞克引自 Rousset (1965: 54-55)。

<sup>14</sup> 關於作者何時編想 W 的故事，書中有幾種說法（頁 18：十三歲；頁 222：十二歲；頁 97：十一至十五歲），並未加以統一。作者似乎有意以這樣的「不一致」暗示其記憶之浮動不明。

白表述；換言之，作者直到最後的結語，依然沒有明講出這座島以寓言的形式，指涉的該是與他童年同時存在的「納粹」集中營。是以，二、作者藉其寓言，想指涉的應不僅限於「納粹」關押猶太人的集中營，因為他即刻提到的是一九七〇年代小說出版同時期（智利）政權的作法。他強調歷史可再重演，現實亦會模仿想像，年少時的奇想，彷彿具有某種不自知的預言性，竟重新落實於現世時空。這樣的安排讓這本書具有指涉聯想上的開放性。三、這個當代發生於南美的事例以及他所引用的《集中營天地》，涉及的都是「政治犯」或「異議份子」的集中營，並非特定以猶太族群為受害者，這也暗示了作者的關注點，與其說是民族主義議題，不如說是普遍的政治迫害議題。<sup>15</sup>

「虛構」部分與「真實」在最末章再度形成交集，再度提醒讀者這則「虛構」故事源自敘事者年少時的想像，同時把運動寓言政治化、歷史化。但何以選擇如是的安排，而非其他更直接批判歷史的方式？書中的「虛構」歷險小說與「真實」回憶可謂篇幅比重相當、等量齊觀，對本書原本似可歸屬的「自傳」文類造成了何種衝擊？以下，筆者就文類問題探討本書的特殊性。

## 參、自傳、浩劫文學、回憶錄

在《W或童年回憶》初版時，一些書評便針對其生命書寫與歷

<sup>15</sup> 培瑞克引述其他集中營的歷史事件來取代直接指名納粹集中營；以一則運動島寓言替代直寫二戰歷史背景；這樣的處理方式以精神分析的觀點很容易被誤解為一種「轉移」的寫法，或者遮掩實情的「屏障」。可是培瑞克並非不知實情，若說他曾因潛意識作用壓抑了創傷的源頭，那也只適於解釋他年少時代畫運動員編故事的幻想，而不適於談論成年作家培瑞克對虛構故事寓言有意識的安排，以及文學書寫策略上的選擇。

史批判雙重議題，檢視其鋪陳結果的有效性與充分性。這部作品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在培瑞克的寫作生涯中具有關鍵樞紐的地位，可據之解釋他其餘帶有自傳性色彩的著作，因而被評者視為解讀培瑞克先前作品的一把鑰匙。<sup>16</sup> 然而，這樣的批評尚未考慮到他在文類方面的突破。事實上，自傳裡雙軌交錯的兩則故事，一虛構一真實，在挑戰傳統文類方面，培瑞克正是以具體實踐的方式，暗示了一種超越「生命書寫」固有文類的新見解，而此作品至少涉及了三種類型：自傳、浩劫文學、回憶錄；《W或童年回憶》與三者皆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

事實上，在《W或童年回憶》出版的年代，傳統「文類」仍持續面臨顛覆的挑戰。首當其衝的正是「自傳」。《W或童年回憶》與《巴特寫巴特》(*Roland Barthes par Roland Barthes*) 同年出版，後者（作為自傳）卻聲明反自傳立場，反映了當時文學批評界對傳統自傳書寫的三項負面觀：對多愁善感抒情傾向的貶抑，對寫實主義的攻擊，以及對語言誠信力的否定；歸根究底，也是對於「真實」概念的質疑。依此時的看法，著作中依傳統敘事邏輯所建構的「我的故事」被認為只是文本內敘事者的言述、一種文本生產後的現象或效果而已，和所謂的作家生命經歷不必然有任何關聯，彷彿在「作者已死」、文本即互文對話等觀念的衝擊之下，自傳若仍崇尚浪漫主義人本中心的個人價值觀，恐將成為難以自證的文類、不可能的書寫。<sup>17</sup> 或者，只能如巴特所做的，在一種精神分裂的自剖當中，一邊寫自傳、一邊解構自我。培瑞克對這些同時代的理論必然不陌

<sup>16</sup> 這個見解，後來也被普遍接受。

<sup>17</sup> 《W或童年回憶》縱然在結構與內容處理方面逾越常規，但對學者勒真內 (Philippe Lejeune) 來講，自傳為其合理的基準歸類，並認定是二十世紀以來最具創意的自傳傑作之一 (1991)。

生，然而相對於亦師亦友的巴特，培瑞克在寫自傳的同時並不會一直強調寫自傳的尷尬窘迫。他不直接進行議論或自承「自傳」書寫不得已的扮角 (jeu de rôles)，更不以負面觀來排拒自傳。他不在文本中展陳自省自辯的議論，而是直接演練敘事。他接受且積極投入文本的可遊戲性，但同時也不否認文本與現實可建立的任何指涉關聯。他也不以主觀「私我」之見，在記憶斷片的起承轉合間強加上因果邏輯，也不以精神分析理論作為唯一的根據。他不以自我為中心作抒情感歎，僅依隨自訂的規則和場域，強迫「我」積極介入、無所不在，卻又不可捉摸。<sup>18</sup>

對培瑞克而言，書寫是他的意願，書寫總是從己身出發。他在《W或童年回憶》中曾回溯他年少時代立下的寫作抱負：「我打算寫自己的故事，我打算從事寫作，這兩個計畫幾乎是同時間形成的」(Perec, 1975: 45)。<sup>19</sup> 這裡，第二個「寫作」不及物 (intransitive) 動詞，始終涵蓋了投入寫作的及物客體與「動機」(寫=寫自己的故事)。培瑞克在一九六五年首次獲頒文學獎項的小說《東西》(*Les Choses*)，<sup>20</sup> 已帶有自傳色彩，而自此成名後，「寫自己的故事」始

<sup>18</sup> 培瑞克無論在明言的自傳或非自傳作品中，皆預設一些規則來自我遵循，符合他作為「文學潛能工坊」(Oulipo) 成員的作法。比如他在(非自傳)小說《生活使用方法》(*La Vie Mode D'emploi*, 1978)中自行規定每章都須加入一項撰寫時發生在他身上的生活小事，而這類細節往往完全融入情節中，外人無所察覺，卻是他自我嚴格要求的規定：窮盡每一規則所可發揮的潛力，使他在文學潛能工坊成員當中無人能出其右。法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已很有成果，但筆者僅能在此簡略一提，以免造成論文主題的失焦。

<sup>19</sup> 原文為：“Le projet d'écrire mon histoire s'est formé presque en même temps que mon projet d'écrire.”

<sup>20</sup> 培瑞克在一九七五年之前的主要作品為 *Les Choses* (1965, 獲頒 Renaudot 文學獎), *Quel Petit Vélo à Guidon Chromé au Fond de la Cour?* (1966), *Un Homme qui Dort* (1967), *La Disparition* (1969), *Les Revenentes* (1972), *La Boutique Obscure* (1973), *Espèces d'Espace* (1974)。

終仍是一再興起的念頭。書寫能否及物，不是他的疑慮，難就難在他所要處理的「缺如」客體——他所未經歷過的集中營經驗。在撰寫《W或童年回憶》之前，他曾醞釀多項自傳性質的長年寫作計畫，<sup>21</sup>足見其執著於書寫生命，但對於如何「書寫」，費盡了心思。這些同時間進行的計畫逐漸造成他極大的痛苦和壓力。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又面臨一些生活轉折：培瑞克的姑丈（養父）過世，姑媽身體日衰；他本身也接受了多年的精神分析診療。<sup>22</sup>幾項自傳性計畫拖延日久，無所進展。最後，有的轉型，有的決定擱置。直到一九七四年夏秋，時機成熟，<sup>23</sup>幾個月間，他幾乎是一氣呵成，完成了《W或童年回憶》的撰寫工作，此後，彷彿他終於解開了永無止息的弔喪心結，也才告別了自傳。

由此看來，在《W或童年回憶》剛出版時，杜維諾（Jean Duvignaud）<sup>24</sup>對這部作品的觀察心得，比起其他評論更能切中培瑞克書寫的核心，他說，這本書「把我們帶往一個憂慮：書寫能夠從我們的**生命**中重新掌握到的是什麼？書寫又與**死亡**建立了什麼關係？（Bertelli, 2003: 190）」這樣的提問，一方面再度以書寫探問生與死的千古哲思，另一方面似也在指出多年來法國文學界所強調的

<sup>21</sup> 一九六九年七月，培瑞克寫信向編輯納朵（Maurice Nadeau）宣告的自傳性寫作計畫有《地點》（*Lieux*）、《樹：Esther 與其家人的故事》（*L'Arbre, Histoire d'Esther et de sa famille*）、《年歲》（*L'Age*）、《我睡過的地點》（*Lieux où j'ai dormi*）和《W》等（Perec, 1990）。其中真正完成的只有《W或童年回憶》。

<sup>22</sup> 有關培瑞克接受精神分析診談一事及其龐大的自傳計畫，可參考許綺玲（2007）。

<sup>23</sup> 他最後決定將原先計畫很久的小說三分法改成二分法，也就是將原來的「回憶敘事」與「後設評論」併合為一，而W島的歷險故事仍自成一個獨立的部分，如此決定了分章組織後，他便很快地下筆完成（Lejeune, 1991）。

<sup>24</sup> 杜維諾是培瑞克中學時代的哲學啟蒙老師，兩人一直保持密切關係。一九六一年培瑞克旅居突尼西亞 Sfax 市期間，也是在杜維諾（當時正任教於突尼西亞大學）的論文指導之下，獲得了一張社會學研究證書（Bertelli, 2003）。

「文學性」若一味走向極端，有使語言在符號遊戲中空轉、自行貧瘠化、空洞化的危機存在；再者，也暗示著培瑞克的書寫正嘗試以一種離心的動勢 (mouvement) 不斷向文本以外的時空延展，而《W或童年回憶》正是代表多年尋覓之後的一個轉機。

就其內容而言，《W或童年回憶》向外延展，或顯或隱地指涉歷史背景，也就使它涉及另一種閱讀框架和另一種「文類」的問題。培瑞克身為猶太民族浩劫下的遺孤，即使不是浩劫本身的直接受害者或見證者，他的生命轉折也必然與這場人為災難有著不可否認的關聯，因此若要為這部作品尋找文類歸屬，「浩劫 (餘生) 文學」(littérature de déportation) 未嘗不是個選項。當然，浩劫文學之所以成立，已預設作者與其所描述內容的指涉性及物關聯，並以其為真。然而，這一生命書寫的特例文類在接受觀點上始終懸於曖昧的地位，不只和當時一般的自傳一樣，須面對語言誠信力的鬆動、真實概念的粉碎，以及感傷語調不合時宜性等批判。更何況這類文章一直存在著定位問題，不但與「何謂文學」之見解有關，有時也會因時機議題而引發爭議。這正是培瑞克所曾面臨的情況。《W或童年回憶》出版時，便有人責怪他對三年前的慕尼黑奧運恐怖主義事件<sup>25</sup> 隻字未提，又認為他避免正面迎對屠猶與猶太族群認同問題，是一種取巧的作法，原因是每回浩劫文學類的著作出版成功，總是多少伴隨著一時的新聞話題，但時機一過，就易被人遺忘。評者的指責便是基於以下的推論：他認為培瑞克只是為了顧其作品期望達到的「永恆性」，所以把他的自傳包裝成「純文學」作品的面貌，以免落入「浩劫文學」新聞話題式的短命存活期，註定很快會被文

<sup>25</sup> 這樣的指責並非公平。培瑞克曾在著作出版之後的一趟赴德訪談中，批評此一以暴制暴收場的人質事件，「將一場運動盛會轉變成了種族仇恨的戰場」(Bertelli, 2003: 123, 193)。亦請參閱本文頁 434「反省」一節。

壇淘汰。這位評論者不啻嚴厲指責培瑞克是爲了沽名釣譽而違背良心，不正視猶太族群存亡史的議題。評者的批判其實透露了一項社會成見：根據一般輿論，明確談論猶太敏感話題的作品往往難以被視爲嚴格定義的「文學」作品，彷彿認定兩者只能處於相互排斥的對立面，文學無力「介入社會」，社會議題無法以「文學」的方式有效傳達訊息……。在這種壁壘分明的觀點之下，從浩劫、浩劫文學到文學，要築起一條可通行的道路，必須尋求的是足以顛覆這類成見的作法：讓作品能長久見證歷史，同時又以文學的價值，超越一時新聞話題性的短視眼界。

如果培瑞克曾令那些懷抱浩劫文學社會使命感的評論者感到失望，是因他在著作中對猶太族群議題沒有明確地表達任何立場，也沒有在書中對相關時事加以評論。<sup>26</sup> 但是事實上，培瑞克並非沒有意識到觸及浩劫題材的自傳文學所面臨的兩難。他自己便曾針對翁恬 (Robert Antelme) 描述自身關在集中營經驗的著作《人種》(*L'Espèce Humaine*)，寫了長篇的評論文章，檢討浩劫文學的困境與出路 (Perec, 1992)。<sup>27</sup> 不過，真正的問題是在於培瑞克左翼的政治立場與國際主義觀點，使他無法認同民族主義者的態度：<sup>28</sup> 他若是想方設法在他的自傳中納入虛構故事寓言，以控訴集中營的暴行，是因他失去了父母，是因納粹施行的種族滅絕，但更重要的，是因集權政治與集中營的設置，並未隨著二次大戰而消失。這就是

<sup>26</sup> 同時，他之所以受人指責，或也因高度期待以他的名聲所該發揮的影響力。

<sup>27</sup> 培瑞克本來想把《W 或童年回憶》一書獻給翁恬 (Dana, 1998)。

<sup>28</sup> 在一部紀念培瑞克的紀錄片 (“Georges [...] Propos amicaux à propos d'espèces d'espaces”; Bernard Queysanne 導演，一九九九年 La Sept Arts 製片出版) 訪談中，同為猶太裔法籍的友人 (Jacques Lederer) 提到每次他說「以色列」，培瑞克總是改口稱「被占領的巴勒斯坦」(Queysanne, 1999)。對於上述一九七二年的慕尼黑奧運恐怖主義事件，培瑞克其實相當的震驚，但是他更關心的是以色列占領區的巴勒斯坦人民處境 (Roche, 1997)。

爲什麼培瑞克的自傳選擇以引喚大歷史的問題作結。而這使得他的生命書寫似乎更接近傳統「回憶錄」(mémoires) 文類的撰寫目的。

傳統回憶錄文類存在已久，比盧騷 (Jean-Jacques Rousseau)《懺悔錄》(*Confessions*, 1782) 之後所形成的自傳文類範式更早；且相對於自傳，回憶錄雖也記錄敘事者的生平經歷，但更著重在凸顯其所見證的大世代背景 (Lejeune, 1998)。因此，通常會寫回憶錄的人多居於歷史顯赫地位，或至少也是近旁親信。然而，隨著時代發展，回憶錄一詞慢慢失去了原來的意涵，與「自傳」用法混淆不清。十九世紀初，浪漫時期個人主義抬頭，夏朵布里昂 (René de Chateaubriand) 的《墓中回憶錄》(*Mémoires d'outre-tombe*)，便將個人史交織於遠近歷史的互文網絡中，並大爲提昇個人主觀感受的重要性。比如爲了顯示自己並未錯失華鐵盧戰役如此重大的事件，即使他不在現場目睹，也要在文中安排自己「正巧」在臨近鄉鎮，以「耳聞砲聲」的聽覺見證，表明自己在歷史大事件中不曾缺席，並且借史實抒發個人感想作結。這樣的情況當然與培瑞克的處境大不相同。後者的自傳僅限於幼童時期，在法南山區小村度過印象模糊的歲月，沒有「故事」，甚至如他在第二章一開頭所宣稱的，「沒有童年回憶」(Perec, 1975: 17) 可言：他只是個無足輕重的孩童！他和歷史的關聯就個人感知的層面來講，可以說是很稀薄而朦朧。<sup>29</sup> 在「真實」回憶的部分，他的確忠實再現了這種迷濛稀疏的印象：依個人的感覺層次，與時代擦身而過的小事寥寥無幾，比如，他記得曾隨老師上山給抵抗軍送食物；他記得村裡人嫌意大利駐軍「看起來很愚蠢」；他還聽親人轉述，說駐守在其寄住地附近的德軍很

<sup>29</sup> 這樣的印象符合首章扉頁培瑞克所選的引言：「那騷動著影子的莫名霧氣，我如何能照亮呢？」(Cette brume inscensée où s'agitent des ombres, comment pourrais-je l'éclaircir?—Raymond Queneau) (Perec, 1975: 11)。



疼愛他……；他記得有次德軍曾到校搜查，但最後只帶走學校養的一隻豬……，<sup>30</sup> 然後是勝利的歡慶氣氛。這些是他個人記得的生活小事，並不足以充分說明整個時代人們所承受和面臨的歷史波折。天真無知的偏私之見容易誤導認知，<sup>31</sup> 培瑞克則欲原原本本地保留個人感覺，不消除彼此可能的矛盾，也不加後設評論。惟歷史寓言啓動讀者的省思才能顯現「大是大非」。以培瑞克作為社會學者的立場，處理生命書寫，「個人」應納入社會群體來看待。歷史確確實實左右了他的命運。不過，既然他不是大事的見證者，也不可能再如夏朵布里昂那樣編導一個「旁聽」者的寫實場景，且既然他不滿足傳統自傳經常採取的全知觀點來交待史實背景，但又希望把歷史引入他的生命書寫當中，以成為「缺此或缺彼都將無以盡述的」元素（即他的童年故事……之一），如此一來，並行交織的虛構歷險小說／寓言，便是他訴諸的方式了。這不一定是唯一的方式，但卻是可行的方式，時間也證明其奏效。簡言之，他將歷史予以意象化，在不直寫歷史事件的情況下，要讓災難記憶成為每一位讀者的切身之痛；在不直述歷史教訓的情況下，讓歷史成為理解故事不可或缺的共同記憶互文。如此，虛構的寓言弔詭地負載著掌握真相的使命、歪打正著的突襲戰略。而運動島的寓言形式，並無針對單一客體，它不止影射納粹，尚且要一網打盡，暗指史上所有類同法西斯的集權政權。借著文學的隱喻張力，保留了彈性想像空間。基於這個歷史指涉的面向，《W或童年回憶》所指引的，正是一個生命書

<sup>30</sup> 這些情事散見於培瑞克 (1975: 77, 122, 139, 153)。依歷史實況而言，法西斯意大利的軍方於南部山區短暫的駐守期間，曾決議對納粹和維奇政權搜捕猶太人的命令置之不理，不採行動，這點無疑是有助於當地躲藏的猶太人保住了性命。培瑞克書中卻沒有提到這個實情，仍然以他小孩時所聽聞的印象如實記下村民對意大利人的負面觀感，為此，他後來的傳記作者對他頗有微詞 (Bellos, 1994: 90)。

<sup>31</sup> 比如這種簡化（而鄉愿）的推論模式：「有位德軍對我很好，所以納粹不是壞人」。

寫研究觀點的轉向，即文學與歷史學的跨領域研究思維已越來越重要。而這或許是本書出版至今帶給閱讀接受的其中一項重要啓示。

至此，綜結上述《W 或童年回憶》與三種文類的關係：培瑞克決意書寫自我生命，有其內在必然，而非否定自我的文本遊戲；但會選擇以半真實半虛構的形式呈現，是希望展開比浩劫文學針對的族群災難更宏觀的視野；引入的大歷史也不是傳統回憶錄中直接見證的特定斷代，而是以虛構世界的 W 寓言，多向指涉，且讓讀者自身潛入殘酷的（書寫）境地去體驗。

一九八二年，培瑞克年僅四十六歲英年早逝。<sup>32</sup> 然而，關於他的作品以及他的生平經歷的研究源源不絕，重要性與日俱增。培瑞克的作品、訪談、手稿、書信、漫畫、筆記，再加上他生前親友對他的種種觀察以及留下的言述，<sup>33</sup> 使「培瑞克」自身成爲一個研究總體，有如一個巨大而繁複層疊的「文本」；唯其不斷歷經各種新興研究方法學的挑戰，已形成此起彼落、眾聲雜音的對話，因而不致僵化爲巴特所定義的一個「神話」，仍繼續指引讀者許多可探索的閱讀路徑。

## 肆、走出地下的地下鐵

後來，我和姑媽去看一個有關集中營的展覽。展場位於拉摩特一畢給一格荷內爾地鐵站附近（就在那同一天，我發現有的

<sup>32</sup> 培瑞克於一九八一年冬得知罹患末期肺癌，因並未積極治療，隔年一九八二年春便猝然辭世。

<sup>33</sup> 勒真內就採用了文本發生學或手稿解析學來對培瑞克的自傳性作品進行解讀 (Lejeune, 1991, 2003)。

地下鐵不走地下而是懸在空中)。<sup>34</sup> (Perec, 1975: 215)

由於 W 島故事帶有歷史指涉及政治寓言的性質，早在該書出版時，就有評者列舉出文學史上同類主題的互文（如 Huxley, Orwell, Swift, Karl Klaus, Heinrich Böll 等）作為參照比較，但或也因此忘了「虛構」之於「真實」的平行作用，忘了這仍是一本另類的自傳文本，也就難以整合出一脈相通的評論；此外，對於其中的政治性意涵，若只是摘引敘事者在書中的三言兩語，不再深入探究，對於閱讀接受的收穫將大打折扣，至為可惜。

但是三十多年來，也出現了相當精彩的論著，試圖在真實與虛構之間整合出一脈相通的評論。從字面上來審視「虛構」與「真實」兩部分文本如何進行密切的交織迴響，馬泉 (Bernard Magné) 的論文有十分細膩的分析。他先將培瑞克定位為典型的「文學潛能工坊」(Oulipo) 文字遊戲實驗家，然後仔細分析了兩個文本，指出其貫穿或「縫合」<sup>35</sup> 兩個故事的方法，是靠音形意相近的單字和音節所暗示，亦即藉著微小的基本語音元素，在兩個世界之間重現或重組。<sup>36</sup> 另一位學者姐娜 (Catherine Dana) 雖同樣也是從單字或詞組的單

<sup>34</sup> 根據勒真內就培瑞克寫 W 一書的計畫草稿字跡和日期來判斷，培瑞克在憶起地下鐵的這段記憶時，約莫同時決定了將原先的小說三分法改成二分法（請參閱註 22）(Lejeune, 1991)。對我們而言，這段「走出地下的地下鐵」可象徵性地詮釋為潛藏者的浮現、「似曾相識卻疏異」([un] heimlich) 的曝現、浮出地表的人間煉獄，或者被揭發的集中營內幕。

<sup>35</sup> 「縫合」一詞的由來，除了現今此字用於電影剪輯的通用意義之外，這裡馬泉別指動物演化學的用詞 (Magné, 1988)。

<sup>36</sup> 藉同義字或拼寫易位，試圖找出具有潛藏意義的排列法；音近形異字 (calembour) 為最常見的文字遊戲原則，比如 la terre de feu (火地) 可讀成 là, taire deux feux (在那裡，兩名往生者沉默不語) (Magné, 1988: 51)。這種欲掩又彰，似藏若現的語言遊戲特質能輕易地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被解釋為一項難以完成的弔喪工作，即佛洛伊德所言之「憂鬱」的表徵，形同對於碎散遺體和殘存遺物的戀物膜拜。

位著手，但比較偏重在字詞所能喚起的猶太族群認同問題。<sup>37</sup> 這些細膩的分析可謂向心式的解讀，<sup>38</sup> 但《W或童年回憶》尚仍欠缺的或許是反向的離心式蒐尋，也就是考察建構運動島寓言的歷史論述根基，而這正是本文接下來要探究的方向。

因此，筆者在接下來的發展中將試圖填補《W或童年回憶》相關的歷史元素 (historématique)，從文本向外跨接培瑞克從童年以至成為作家所歷經的年代，將他的故事 (histoire) 所「行經的路」，透過大歷史 (Histoire) 貫穿起來。而此處引領我們搜證和思考的便是「運動」，即 W 島故事的中心主題，也是如胡瑟所言的「集中營」構成原則。筆者想再重複一遍前言裡的概述，以提示後續重點：對培瑞克而言，唯經過歷史原則圖象的掌握，並倚之劃定時代經驗的座標，方得以揭示個人生命經歷的真知。而他所掌握到的歷史原則圖象，是以一則充分發展的運動島寓言來具體呈現。

以下，筆者將追溯近代法國有關運動意識形態的發展歷程，以證明培瑞克藉「運動島」的濃縮主題來進行多重的政治歷史影射，是切中要害而有效的選擇。關於運動方面的研究，雖已見阿提耶 (Hans Hartje) 的論文提示 (2000)，但除此之外，則少見有關運動

<sup>37</sup> 比如「刺」，其聯想為：猶太人上衣胸前被硬是（刺）繡上六角形的大衛黃星 (Dana, 1998)。妲娜的方法或可吻合培瑞克曾明言的作法：他指出，在整本作品中，他未曾直接命名「德國」一詞，只是布陣了相關的指涉，即出現德語字、德語姓名、德語的加油口號等，以此間接迂迴的手法，暗示整起事件與二次大戰時期的納粹德國有關 (Bertelli, 2003)。

<sup>38</sup> 以「遊戲」作為「運動」的對立面以提供互補或修正的想法，有著普遍的影響力。妲娜就認為培瑞克在處理運動島／集中營的嚴肅問題時，便是在書寫方面發揮了文學潛能工坊文字遊戲的精神，及施展其反抗策略 (Dana, 1998)。馬泉對培瑞克文字排列組合的拆解，也是本著遊戲精神，分析手法更為透徹。從政治角度看，亦可如巴特所言，作家應揭露文字具有的法西斯本質，再去玩弄拆解文字 (Burgelin, 1988: 49)。然而，此一看法實已成為後結構批評經常提出的一種解釋公式。筆者雖然無異意，但在此仍想跳脫這個已成定見的分析規則，從其他角度切入補充。

主題的深入評論。事實上，在《W或童年回憶》出版後，當年六月培瑞克曾前往西德 (Sarrebruck市) 接受一項訪問。<sup>39</sup> 訪談中，他一開頭就針對「運動」表達了他的看法，短短數語卻已觸及「運動」在歷史政治牽連下的幾個面向，遠超出《W或童年回憶》敘事者所明白表述的。就筆者所知，至今這篇訪談文章仍少有學者引用或提及。縱使阿提耶的論文指出了維奇政權對體育運動的重視，瓦利 (Pascale Voilley) 也提醒讀者，從戰後直到一九七〇年代，左翼社會學理論針對運動暴力的批判，對培瑞克有一定的影響 (2004)，但是這兩位學者都未提到這篇訪談。<sup>40</sup> 然而，這篇訪談之所以具有關鍵性，是因其內容足以確證他所設想的運動島寓言應足以涵蓋多重的歷史指涉。培瑞克在訪談當中言簡意賅，下一章將彙整其說法。不過，筆者認為在此之外，尚可加以擴充，讓「運動」主題，貫穿於培瑞克生命平行進展的整個歷史中，甚至再溯自上一世紀法國第三共和時期，也就是催生現代奧運的年代。

## 伍、從 W 島到火地島

W 和我的奧林匹克幻想並不那麼類似，正如奧林匹克幻想與我的童年也不更為相似。但是就在它們交織成的網絡中，和我為此而有的閱讀當中，我知道就在那裡刻印著、描述著我所曾行經的路，我的故事的行進，我的行進的故事。(Perec, 1975: 18)

<sup>39</sup> 培瑞克在訪談中表示，他特意前往德國談其新作，是帶著使命感，想把《W 或童年回憶》介紹給德國人，借之作為歷史的見證，並希望人們能正視集中營曾經存在的慘痛事實 (Bertelli, 2003)。

<sup>40</sup> 培瑞克這篇西德訪談實錄的法文翻譯，是刊登於二〇〇三年方才出版的 *Entretiens et Conférence I*。

以下筆者選擇從《W或童年回憶》撰寫完成的年代往回溯，試圖從四個時段、幾則史實重點，去連結運動論述。從後談起，是希望把透視點放在培瑞克寫作的時間點，從那裡回望歷史所開展的地平線。這裡所串連的事件自然不能涵蓋整體的史實背景，而是被個別孤立出來，放大重組，依循的是多源分枝，如根莖、如星座、如水晶玻璃多向折射般的歷史形象。<sup>41</sup>

### 一、反省：一九六〇至七〇年代對運動的批判

培瑞克在上述赴德的訪談中，列舉了以下與「運動」有關的當代事件：(一) 一九七二年慕尼黑奧運期間以色列運動員被綁架為人質的恐怖主義事件。(二) 一九七四年法國總統大選，一名保守派候選人煽動性的言論：「應該把年輕人送去運動場！」。<sup>42</sup> (三) 李芬史塔 (Leni Riefenstahl) 所拍攝的柏林奧運紀錄片《運動場上的諸神》(*Les Dieux du Stade*, 1936)，在沉寂多年後捲土重來，試圖以其電影美學價值掩蓋意識形態上的偏差，<sup>43</sup> 因而引發批評聲浪。這些與運動有關的時事，皆是政治事件，並以武力、暴力、民族主義為基調。

從這些事件中，培瑞克所體會到的時代意義，以及和他個人的

<sup>41</sup> 關於歷史多源形象的討論，散見於 Walter Benjamin, Aby Warburg, Giorgio Agamben, Gilles Deleuze, Georges Didi-Huberman, Suzanne Liandrat-Guigues 等人的著作中，如 Agamben (1998); Didi-Huberman (2000) 等。

<sup>42</sup> 當時法國總統候選人之一 Jean Royer 曾宣稱：「應該把年輕人送去運動場！」對培瑞克而言，這句話意味的是以強加的紀律限制個人的自由意志與行動，以運動之名組織、訓練青年，只為了有朝一日送上戰場 (Bertelli, 2003)。「運動場」到「戰場」的直線邏輯，不僅指軍事化管理高度強調的秩序、服從、規訓，更指向法西斯政權藉獨裁集權與惡法所施行的現代化集體控管機制。

<sup>43</sup> 那一屆的奧運儀式耀武揚威，充滿著氣勢逼人的種族優越主義。這部片子的捲土重來曾引起宋妲 (Susan Sontag) 等學者的嚴厲批判 (Sontag, 1983)。

關聯，又須放在一九六〇年以後三項社會思潮的語境中來理解。這三項社會思潮同時也為培瑞克提供了批判當代和反省過去的依據。三項思潮指的是運動的社會批判，對二戰史的重審，以及猶太民族意識的覺醒；一一簡述如下。

運動的議題是當時西方一些左翼社會學者對整體社會變革之訴求的一部分。具體而言，在當時普遍的反戰氣氛中，他們嚴正警示運動與戰爭準備的實質或精神關聯；特別是在集權國家，體育運動極易淪為國家機器「控制、剝削、與迫害的工具」(Bertelli, 2003: 194)。<sup>44</sup> 此外，也正是在此時期，運動史的研究進入了歐美大學院校，成為社會學與歷史學的一項專攻領域，現代奧運的發展史得以更完整地重建起來，並從各種角度受到檢驗。<sup>45</sup> 由此看來，培瑞克會在這段時期憶起年少時編造的運動島故事，或許非全憑偶然；對這些理論的接觸，多少促成了記憶重返的機會。同時，各種史料也必然提供了描述W島創建史、立國精神、體訓規則等的參考。

其次，是關於二次大戰的紀念對象與內涵的轉變：姐娜在其研究記憶、紀念與敘事的著作中曾指出，戰後初期，法國社會對於戰爭的集體紀念，偏重的是勝利的歡慶、抗戰者的勇氣與團結愛國的氣氛。可是在阿爾及利亞戰爭（結束於一九六二年）與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六日戰役之後，許多潛伏於社會內部的族群衝突問題，相繼浮上了檯面，加上一九六〇年代為了訴求社會變革，又有一連串的

<sup>44</sup> 反觀西方資本主義消費社會該檢討的，除了競爭原則的激化與暴力，會造成人的異化，也指責文化工業如何透過對運動表演的操控，製造消費欲望並編造社會昇平假象的神話。不過，當時學者也試圖提出對應之道，主要欲藉著「遊戲」的自由與自主性來抵制運動的霸權。比如有所謂的「好玩運動」(fun movement)。大體而言，反映的都是一種後現代精神。然而，「遊戲」的概念亦可能流於簡化的意識形態，成為又一暫時逃避問題的短暫對策而已 (Voilley, 2004)。

<sup>45</sup> 有關運動研究的背景與批判，筆者主要參考的資料，除了上述瓦利及阿提耶關於培瑞克的論文以外，相關而較為完整之研究，可參閱 Morgan (1994)。

論戰與激烈抗爭。就在此時，許多知識分子體認到重新回顧二次大戰歷史的必要性，欲重新追究責任，挖掘一度被壓抑的史實，試圖找尋社會問題潛在的根源 (Dana, 1998)。<sup>46</sup> 對於二次大戰的紀念對象也因之逐漸轉向了受害者、犧牲者的一邊。

其三，與上述的時事背景亦有所關聯，但關係到猶太後裔的認同危機或民族意識的新體認。從自傳中，我們知道培瑞克的父母和祖父母是來自波蘭的猶太裔移民，約莫於二十世紀初一次大戰前後來到了法國。這些東歐猶太移民，經濟上普遍居於弱勢。選擇法國，是因他們嚮往「法國為雅各賓黨人 (Jacobins) 的國度，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普世價值」。<sup>47</sup> 沒有料到的是到了二戰期間，在納粹和維奇政權統治下的法國，猶太人會被當作社會公敵，遭到驅逐滅絕。正因父母輩認同法國的決心，加上戰時被迫隱匿身分以逃避追捕迫害，使得像培瑞克那一代的許多猶太青年，在成長過程中無緣接觸祖先文化，對猶太民族的語言習俗全然陌生。不過對此，作為法國現代之子的培瑞克並無深刻遺憾，因青年時期的文化養成使他以道地的法國青年自居，並接受當時知識分子主流的左傾思想。這種情況，直到一九七〇年前後才有了變化：除了上述中東、北非的戰事以及一連串的社會事件引發爭議之外，<sup>48</sup> 若干法籍猶太人檢視

<sup>46</sup> 約莫於同一時期，Marcel Ophuls 製作了紀錄片《哀傷與憐憫》(*Le Chagrin et la Pitié*)，Louis Malle 則拍攝了劇情片《通敵少年》(*Lacombe Lucien*) 等，皆是處理法國維奇政權引人爭議的施政方針，以及當時個人面對危機時的道義抉擇等議題。

<sup>47</sup> 當時許多來自東歐的猶太移民來到法國後，不惜放棄猶太宗教、習俗以及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活方式，決心融入法國社會。二次大戰前，許多人選擇加入共產黨，並於戰時投入地下抗戰組織。這段二十世紀上半的猶太移民史背景，筆者從 Hervé Liotard-Vogt 於一九八五年所製作的紀錄片《美城：巴黎猶太區尋跡》(*Belleville: Traces d'un Paris Yiddish*) 獲益良多。關於一九六〇、七〇年代猶太人的族群意識覺醒歷史的重建，主要參考貝雅 (Stella Béhar) 對培瑞克的研究專著。

<sup>48</sup> 特別引起轟動的一則社會新聞是關於一名波蘭後裔法國人 Pierre Goldman 頗受爭



身分認同問題的著作出版，也引起了迴響。<sup>49</sup> 培瑞克在此情況下，並不想改變生活與信仰，只是不免要反思血緣身分與群體共同命運的關聯性。許多猶太後裔的知識青年，必須在決意認同的馬克思（或雅各賓）國際主義政治信念，以及身為猶太族裔之獨特性體認之間，尋求和接受一種矛盾並存或多元主義（pluraliste）的妥協狀態（Béhar, 1995）。培瑞克沒有因此而成爲民族主義者，他實際上是把「猶太民族性」視爲他的「欠缺」元素，接受此「欠缺」，並視之爲他與其他猶太人之間的差異（Perec, 1995）。認同意識的省思、追溯家族史的欲望、還有不曾真正完結的弔喪工作，三者匯聚成一股動力，讓培瑞克想更進一步了解自己逃過的那道「歷史的大巨斧」（Perec, 1975: 17）。選擇一個看似無涉猶太問題的W運動島寓言以述說歷史，正符合他經過反省、選擇後，對個體與群體關係在政治上的體認。

## 二、忘卻：戰後的運動美好幻想期

培瑞克希望以觸動讀者感知的方式揭露歷史真相。而這是他在一九七〇年前後，重新憶起W島幻想以前，未能充分表述，也一直無法忘卻的。培瑞克幻想W島是在一九五〇年以前。對於這段年少時光，培瑞克只留下很少的記述。<sup>50</sup> 在《W或童年回憶》末尾，他對這段時日的生活記事只有三言兩語帶過，彷彿當時唯一的重大事

---

議的刑事案件（Goldman 也是極左派的遊擊隊員、社會運動者，後來在巴黎遭到暗殺）（Béhar, 1995）。

<sup>49</sup> 一九七五年之前有 Albert Memmi, Pierre Goldman, Albert Cohen, Edmond Jabès 等；一九七五年之後，則有 Schmuël Trigano, Alain Finkielkraut, Guy Konopnick, Dominique Schnapper 等猶太裔作家作品出版（Béhar, 1995）。

<sup>50</sup> 培瑞克只曾在一九六五年寫了一篇回憶自己十一、二歲時逃家經驗的短文〈逃家地點〉（“Les Lieux D’une Fugue”）（Perec, 1990: 15-31）。

件就是他一邊畫著運動員的漫畫，一邊幻想著W島的故事。

當時法國社會的運動夢，不是一場惡夢，而是個美麗的屏障。運動對當時的生活有多重要呢？事實上，戰爭結束後所謂的冷戰時期，形成了勒坎 (Jacques Lecarme) 稱為「運動之美好幻象」(illusion sportive) 的時期。<sup>51</sup> 古希臘時代的諸城邦是在和平休戰期間舉行運動比賽；然而，現代社會神話卻顛倒因果，宣稱只要運動比賽能夠熱烈進行，就代表社會必定一片和諧。當時的法國政府確實希望藉體育活動來帶動樂觀的社會氣氛，以掃除大戰時的陰霾。<sup>52</sup> 配合戰後精神上的需求，運動比賽似乎有了新的社會意涵，但實際上，只是為同樣的強身健國意識形態換上輕鬆休閒的外貌。在《W或童年回憶》的第二大章，即剛進入W島時，有一段描繪運動場的景觀：入口處即刻望見「高大宏偉」的建築，接著映入眼簾的是簡潔有力，足以振奮人心的「大字標語」，還有公告競賽成績的「巨大看板」，讓「初到者必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Perec, 1975: 96)！顯然，以雄偉的建築藝術襯托有如希臘雕像般、體格健美的運動員，這種場景正符合柏林奧運以來現代大型體育活動所刻意塑造的表演性質 (Gillet, 1967)。接著，還出現了一段括弧內的評語：「面對這麼果敢堅持的紀律、夙夜匪懈的英勇表現、全力以赴的戰鬥、令人陶醉的勝利，有誰不覺得歡欣鼓舞、興奮無比呢？(Perec, 1975: 96)」這種自信滿滿的口吻，強調一種無可辯駁、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常識（「有誰不…」），期待普遍的共鳴與齊聲讚歎——這豈不正是「運

<sup>51</sup> 勒坎曾指出在培瑞克的作品中有不少真實或杜撰的運動員小故事；特別是在《我記得》(Je Me Souviens) 一書他所蒐集的四百八十條回憶中，有不少關於體育賽事和運動明星的回憶，構成了一九六〇年前後法國人民的共同記憶 (Lecarme, 1993)。

<sup>52</sup> 如本文所述，縱使在戰爭期間物資匱乏的情況下，維奇政府仍規劃了各種體育教學活動和比賽；到了戰後，維奇政權垮台後，部分政策得以延續下來，以較充裕的條件逐漸落實。

動之美好幻象」年代藉著收音機、新聞片，以及剛問世的電視媒體，所強力放送的運動神話訊息？

勒坎在談到這個時期的少年培瑞克時，不禁憂慮：當時熱衷於觀看運動比賽的天真少年，是否亦曾自我投射於筆下所繪之勇猛好戰的運動員？<sup>53</sup> 對少年培瑞克而言，也對當時大多數的法國人而言，這是一段不欲多談往事的療傷期，有意無意排拒了慟心的反省工作，不願在回顧中重掀舊傷。

### 三、承受：二戰時的強身報國論

再往回溯，一九四〇年代初，法國承受了重大的創傷。戰爭爆發，大半個法國很快被德軍占領。大勢已去，還不滿六歲的培瑞克來到了維奇政權控管下的南方，避居高山區的小村。正是這段時日的生活點滴構成了《童年回憶》第二大章的內容。幼小的培瑞克仍懵懂無知，生活過，卻無以掌握大歷史與社會的脈動。當時，他與其他法國人一般，並不知曉猶太集中營的存在。小培瑞克或許也不清楚由一位老邁元帥領導的維奇政權正力圖振興「法蘭西民族」，<sup>54</sup> 並將國運的復興與民族命脈的延續，強力寄託在培育強健活潑的兒童與青少年身上。<sup>55</sup>

事實上，以國民身心健康作為國力強盛的指標，這是百年來特別凸顯的意識形態，可上溯自十九世紀，同時也受到生物研究興盛

<sup>53</sup> 勒坎問：「畫（運動員）圖的孩子是否站在那些表情『無人性』的運動員那一邊？」（Lecarme, 1993: 40）。「無人性或不似人樣」（inhumain）的運動員是培瑞克自己在《W 或童年回憶》中所用的形容詞（Perec, 1975: 221）。

<sup>54</sup> 在前述赴西德的訪談中，培瑞克也提到維奇政權採行的許多體育文化政策，特別是青少年勞動營（Bertelli, 2003）。由此，我們可合理地推論他的確已預想到 W 島的寓言至少是要同時影射納粹德國與法國維奇政權。

<sup>55</sup> 「青年救國」的神話在當時至為重要（Pecout, 2007）。

的影響。但是生物學研究的怪胎、社會達爾文主義，再結合極端化的科學理性主義，而後形成了納粹種族主義。盧卡奇 (G. Lukács) 在《理性的毀滅》中曾指出，希特勒本身或許並不真正相信這些說法，但他必定知道可以藉之無限誇大為一種思想與信念，用以驅使群眾，超越舊有的國家觀念，遂行其跨越國界以侵略他國的野心，甚至壓制剝奪其他民族的生存權利 (盧卡奇, 1954/1997)。無論如何，維奇政權時代有不少學者及百姓也聽信其言。根據其未曾明言的衍生之見，人，或者由人所結集成的國民群眾，亦不例外應以「物種」的觀點看待；國家對其人民，就以物種的存活機會（「適者生存」）來培育調教，避免其「退化」，以維持優良「純種」——而精神上的「墮落」只不過被視為更嚴重的「退化」的一項副作用。——主張反共、反猶、反智、仇外，是因這些因素對於好「種」的延續有害，必須以「衛生」上的理由加以清除。人群的組合，也應拋棄國家或社會等「不自然」的集合體，讓博愛的觀念僅實現於「家庭」、「家鄉」之內 (Giolitto, 1991)。正是因此，當時的政策言述或官方哲學家的說辭當中，竟充滿了對於身體狀態極盡關切的赤裸語彙，比如「美肌的瑪莉安」、「造就一個強壯猛肌的法國」(Pecout, 2007: 180)，而viril (有活力／陽剛／有生育力的) 更是一再出現於各種文宣的關鍵詞。這種非常生物性的「人」的觀念還被冠上一套冠冕堂皇的精神意義說詞。新的「人類」(homme) 常以être來指稱，此字在法語用法中，既是哲學上所用的「存在」，又是生物學裡的生「物」(l'être vivant)；<sup>56</sup> 反對「個人」、共和國引以為傲的「公民」(citoyen) 等人之稱號，其原因，是官方認為這些字所承載的概念會把人減縮成社會運作的單元符號，不再是腳踩在土地上活生

<sup>56</sup> 或者有時用 *personnalisme* 來取代大革命以來強調的 *individualisme* (個人主義) (Guillon, 1992)。

生、有血有肉的人；況且還將公民參與社會的權利，視為自由、平等的濫用，也就是公民權反而變成破壞整體「秩序」(Ordre) 的亂源，故應加以限縮規範。改變人的稱號代表了管理人的方式隨之改變。

綜言之，勇猛、秩序、紀律，是維奇時代的執念。在此情況下，維奇政權以推動「國民革命」(Révolution Nationale) 之名，一方面相當重視體育，另一方面也同其他法西斯或準法西斯國家一樣，熱衷於創造各種名義來組織青年群眾，從事各種體能訓練。然而，歷史學家嚴厲地指出那段時期是空有高遠的「理想」，卻施行無力。官方提出的政策、文宣，與實踐的情況頗有落差。何況在戰亂的衝擊之下，民生物資嚴重匱乏，師資不足，體訓成效也極有限。在玖利托 (Pierre Giolitto) 所著的《維奇青少年史》(*Histoire de la jeunesse sous Vichy*) 當中，就提到當時全國各地都設有青年勞動營 (Chantiers de la Jeunesse)，培瑞克避居的山村 (Villard-de-Lans)<sup>57</sup> 也設了一個營，但是因氣候太冷，居住環境與衛生條件都很差，物資也缺乏，竟曾發生勞動營的青年驅趕女校學生，強占其宿舍的事件。同樣是在青年勞動營裡每日要進行的「野外體能活動」(l'hébertisme)，往往因時間過長、學員體力無法負荷，以致引起學員和家長的極大反彈，批評這是「野蠻」之舉 (Giolitto, 1991: 582)。這類事件層出不窮，更有許多逞強的作法。維奇法國雖未能從實質上去達到改善體能的顯著成效，也要先仿效 (想像中的) 納粹青年，或者至少要在日常生活中「導演」出強健的法國青年形象，以鼓舞民心：比如在群體出遊時，走路要抬頭挺胸，以行軍步伐踏步

---

<sup>57</sup> 一九四二年冬，此地曾舉辦冬季運動賽，有來自法國各地勞動營的五百名青年到此會師 (Giolitto, 1991)。

前進，充滿不可或缺的「活力」(viril)，並拉大嗓門齊聲唱歌。<sup>58</sup>

W運動島殘酷的體訓、制度及惡法，島民身心難以承受的無止盡折磨、無以逃脫的絕望感，指涉的是慘無人道的集中營。但是其中有些關於體育競賽表演的細節描述，如舉臂行禮、<sup>59</sup> 儀式、口號、「理想」標語等，影射的同時是法西斯政權的展演，也是學法西斯不成（不敢或不盡然情願）的維奇政權體育政策。因此，一方面，W島恐怖的虐待狂社會，揭露的是納粹集中營的慘劇；另一方面，故事中那笨拙魯莽的運動員表現，和極為不堪的體育競賽成績，所構成的荒誕醜怪圖像，則是諷刺維奇政權的鬧劇。至於對人的品種控管，維奇政權追隨納粹種族主義，想望卻無法徹底作到的，W島則以最野蠻荒唐的法規和執行手段，以「搶奪賽跑」來決定誰有資格孕育「優生」的下一代 (Perec, 1975: 167-171)。<sup>60</sup>

現今，眾所週知的一九三六年柏林奧運，充滿了納粹希特勒主導的民族沙文主義氣燄，加深了國與國之間原有的角力與對立。<sup>61</sup> 事後看來，運動場上國家之間的競爭，更彷彿事先演練了即將爆發的戰事。不過，同一年，法國內部的大事則是人民陣線 (le Front Populaire) 組成了左翼聯合政府。有趣的是，當時無論是偏左或偏

<sup>58</sup> Pecout 曾不客氣地指出維奇政權施行無力，「國民革命」猶如一場「鬧劇」(farce) (2007: 32)，是「澆水的人被水澆 (les arroseurs arrosés)」(2007: 212)。

<sup>59</sup> 筆者節譯：「W 島的運動員向看台上的高官，即『運動場上的諸神』，行舉手敬禮式」(Perec, 1975: 219)。這種敬禮式在一九二四年巴黎奧運便為法國所採用，原非納粹所專有。

<sup>60</sup> 為了培育優種，官方所規劃的追逐強暴競賽應是 W 故事中最殘暴而荒謬的一章：競賽者（特選的男選手）追趕裸身的特選年輕女子，追上了就地強姦。選手為求勝而設想的各種危險作弊為裁判所默許，且以之來增添比賽的表演可看性。

<sup>61</sup> 然而在此同時，不知當時已有多少法國人，正暗中欣羨納粹青年的英姿（代表著國力的強大和民族優越性）？根據紀錄片《哀傷與憐憫》(Le Chagrin et la Pitié) 的實錄，維奇政權後期的總理拉瓦爾 (Pierre Laval) 本人尚且公開宣稱第三共和的瓦解與德國的入侵，對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法國是「有益處的」。

右的政黨及社會組織，甚至連極欲爭取信徒、重振影響力的天主教會，都對體育運動和組織青年團體很感興趣 (Pecout, 1975)。後來，維奇政權的一些體育政策構想就是承襲自人民陣線時期的規劃，<sup>62</sup>也就不足為奇了。總之，從二十世紀初以來，不分左右黨派，體育文化的快速發展乃得利於普遍的社會迷思，進而落實強國侵外的野心：培育新人類，開發新人種，強身以救國，強國以征服世界！

#### 四、回溯：百年的體育推動史

培瑞克之所以能夠想像一個全面貫徹現代奧運理想的國度，乃是推算理性科學主義與生命政治在發揮極致效用時，所能演變出來的最終結果。W 島所奠基之思想，必須追溯到前個世紀的歷史，特別是和體育有關的發展，以下分從兩個方面來看：催生現代奧運的動機之一是為了規訓民眾，而體育教育的普及化則為了更進一步提昇國族的戰力。分述如下。

研究運動與戰爭關聯的學者詹橙 (René Jantzen)<sup>63</sup> 將古貝爾丹 (Pierre de Coubertin) 催生現代奧運的動機，直往上溯自巴黎公社 (la Commune de Paris) 短命史的年代；那年古貝爾丹雖只有八歲，但詹橙認為那段混亂的時期，已足以使這位貴族子弟和保守的布爾喬亞階級心生回歸秩序 (Ordre) 的強烈渴望 (1992)。古貝爾丹後來致力於體育教育的推廣，深信藉此可達到穩定社會秩序的目的。他認為當務之急是先從青少年的教育作起，以體育來規範血氣方剛的

<sup>62</sup> 維奇政府專為體育教育設立的委員會便是承襲人民陣線時代 Léo Lagrange 所負責的職權，再加以擴充 (Giolitto, 1991)。

<sup>63</sup> 也有學者認為詹橙的看法太激進，有時為了支撐其論點，不免失之偏頗，瓦利 (P. Voilley) 就認為他在論《W 或童年回憶》的文章裡，只是藉這篇自傳來全力攻擊古貝爾丹奧運理念中好勇鬥狠的傾向 (Voilley)。但是詹橙透過社會意識形態檢驗古貝爾丹的主張，仍有文獻論述根據，不無許多參考價值。

少年，讓他們習於服從、紀律與自制，教他們將體力宣洩於運動場上以「控制怒火」，避免成爲「暴徒」，有害社會秩序。在他的奔走下，終於促成了現代奧運的復興。詹橙相當嚴厲地指出，古貝爾丹的想法不但是歐洲中心論，男性特權論（W島在這兩方面都實踐得很徹底），<sup>64</sup> 明白講，也是以維護既得利益者之掌政權爲考量。<sup>65</sup> 運動賽事的週期性（W島在這方面有非常週全的規畫），標誌著不斷循環的狀態，事實上也有助於維持社會現狀，防止任何的變革。

對於運動員個人的要求，古貝爾丹抱持的是維護少數菁英特權的立場。他提出了著名的回歸中世紀騎士精神：運動員要以表現「活力 (virilité) 和高貴性 (noblesse)」來自我期許 (Jantzen, 1992: 55)，由此造就新人類，透過競爭產生「新貴派」(nouvelle “aristocratie”) (Jantzen, 1992: 62)。他爲了樹立運動員的崇高精神，規定業餘者才有資格參賽。他認爲體育活動應基於純粹無利欲之信念，爲準備比賽所付出的心力，本身即是目的，不是手段。可是，這一高亢的論調和胡瑟所指出的，集中營內只有無目的、無功用性的「運動」原則，不正以相似又顛倒的方式遙相呼應！詹橙認爲，說穿了，這只是在鼓吹「自虐」(63)。<sup>66</sup> 在古貝爾丹的奧運神話中，尙且有許多理想和口號（箴言：「爲生存而戰鬥」）與維奇政權的主張一致。因此，也可想見一個W運動島的寓言不只同時諷刺納粹集中營、維奇政權的體育政策，也質疑現代奧運的英雄崇拜。在W島的最末一

<sup>64</sup> W 島民的組成結構主要是來自西歐和北歐的白種人。運動員則只限男性；女性只管生育後代。

<sup>65</sup> 比如運動訓練過程中，教練與實習者之間絕對不對等的關係被認定有其必要性（W島嚴格厲行），同樣的，裁判與選手的輩份倫理一如社會階級差異，具有穩固權力位階的作用，也被認爲是必要的 (Jantzen, 1992)。此外，強調自由平等的個人主義易導向無政府狀態，也令既得利益者深感畏懼。

<sup>66</sup> 詹橙如是歸結：古貝爾丹是以他所誤解的上古精神為榜樣，試圖建立的，只是一種「崇尚肌肉而毫無神聖性的宗教」(1992: 69)。



章，敘事者描繪島上運動員困窘笨拙的模樣：「應該去看看那些田徑選手，<sup>67</sup> 身著條紋衫，很像一九〇〇年<sup>68</sup> 諷刺漫畫裡的運動員，他們拼命往前奔，做出醜怪的衝刺動作」(Perec, 1975: 219)；敘事者語調冷漠，不放過任何細節，一路描寫下去：O字腿、其大無比的膝蓋骨、剃光頭、皮包骨、面色憔悴、兩眼凹陷而茫然……，讀者念到這裡才恍然大悟：眼前描寫的不就是集中營裡的俘虜嗎？

當然，近代體育的推廣不是靠一個人的力量就可達到成效的。由於古貝爾丹對奧運復興的堅持，現今提到他總會誇大了他對體育的貢獻，而事實上，推廣體育也是當時其他法國人的主張，但相對於古貝爾丹的菁英貴族思想，一些信奉實證主義的「專家」則欲促成體育的全民化。轉捩點也是在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之後，法國的一些醫學界人士與衛生專家檢討法國戰敗的原因，咸認為是國民體力差距太大的緣故。反觀當時普魯士已成功地中等學校推廣體操練身活動，法國人為了挽救國族體力（進而加強「戰力」），決定起而效之，但推行過程受到相當大的輿論阻力。<sup>69</sup> 等到二次大戰時法國又一次敗在德國手下，維奇政權只得舊調重彈，但如前所述，又是以一場拙劣模仿 (parodie) 的鬧劇收場。

至此，我們已看到在法國歷史上，體育的推廣與德法長久的對峙衝突，以及更普遍的民族主義思想散佈有極大關聯，顯見運動與政治之間的糾葛已非一朝一夕之事。

<sup>67</sup> 值得一提的是，W 島上進行的運動項目，培瑞克大體上就是依現代奧運初期排定的項目來規劃的，主要為田徑類，再加上馬拉松等長跑項目。

<sup>68</sup> 一九〇〇年，第二屆奧運選在巴黎，與萬國博覽會同時舉行 (Gillet, 1967)。

<sup>69</sup> 法國要在學校推動體操活動之初，受到的各方阻力相當大，其一原因是在法國知識分子階層的刻板印象中，體格強健者與中下勞動階層的莽夫形象不可分，受這種心理及階級意識的影響，極力排斥體育。這點可參見日本的法語文化學者鹿島茂在其雜感文〈法國的運動〉中筆調風趣的簡介 (1993/2005)。

## 陸、作為互文的《神祕島》

W運動島指涉百年來的體育訓練與其政治軍事目的，在過度畸形發展之下顯現的荒謬與恐怖。書寫這樣的世界，須藉由一種恰當的語言風格來呈現。法國探險小說家維爾納 (Jules Verne) 在一八七一年起開始構思撰寫的《神祕島》(*L'Île Mystérieuse*)<sup>70</sup> 在這方面或許提供了有利的借鏡。

事實上，《神祕島》<sup>71</sup> 與W有幾項互文關聯已為研究者所熟知：比較故事內容，兩者都有海難和失蹤事件的情節；W更有意承襲探險小說文類的敘事模式，尤其開場部分，人物以獨白回溯往事，欲言又止，一邊強調其經歷之獨特性，一邊營造引人好奇的神祕氣氛。此外，培瑞克還為W島設想了一個與神祕島相近的地形輪廓。

但是，更重要的是二者在書寫方面的相近性。維爾納的奇幻歷險故事，一向在背景細節方面都有實證考究的地理和其他科學知識為依。同樣的，培瑞克筆下的W島，從地理形勢、起源歷史、社會制度、行政組織、典章法規到生活方式都有詳盡的介紹，明顯地仿效維爾納式實證精神的「教科書」解說方式。這種鉅細靡遺、毫不鬆懈的百科全書式說明，在一章一章的推進過程中，先是引起讀者的好奇，既而逐漸令讀者感到窒息，最後變成了難耐的折磨。順著島上「一切以運動為生活目標」的理想，生活大小事都依此作了最「合理」而有最大成效的設計安排。當這樣的理性邏輯被推演至極限時，讀者才發覺這是何等地荒謬可笑、慘無人道。知識百科一

<sup>70</sup> 從《W 或童年回憶》可知小培瑞克在避居南部山村的最後時光，開始喜歡閱讀，維爾納的探險小說是他百看不厭的讀物 (Perec, 1975: 193)。

<sup>71</sup> 法國在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戰敗後，民族主義的對立意識氣餒高漲，瀰漫於整個法國社會，不只激勵了體育的推動，也多少影響到作家的寫作。面臨德法敵對狀態與敏感的民族主義對峙，維爾納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在他的故事角色分配上避開特定國籍人士之間的對立，以免引起公憤 (Vierne, 1973)。

且用以服務集權獨裁者的統治，便成了最可怖的天羅地網，以最爲斤斤計較的法令，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個細節中。

這樣的內容配合的是隱形、匿名、無所不在又無法指認的陳述活動主體，因而顯得更加疏離、冷酷；<sup>72</sup> 因此，不只是內容情境殘酷。當讀者一進入W島，在那過於詳盡的說明當中，不見嚮導何在，只越發感到迷惘，猶如已被孤絕地棄於島上。陳述的語調有時尚且不一：從客觀精細的科學性分析、導遊、官僚腔、新聞報導、急躁的口令，到不動聲色的反諷等，悄悄地變換著，猶如立法者無所不在的多重變身，也迴響著從近代體育發展的各種運動言述，<sup>73</sup> 形成了隱晦的歷史互文，層疊交響；在這座充滿運動史話的迷宮裡，在如此交織繁複的網絡中，步步逼近最殘酷、最荒謬的境地。<sup>74</sup> 讀者越讀越驚，陷入了孤立無援的恐懼。直到最末一章，「真實」部分的敘事者才現身點破了真相，而讀者亦已隱約預想：這就是集中營的世界。讀者從閱讀過程經受了一次心理創傷，一旦真相被指明，彷彿才破除了魔咒，也逐漸劃出了一道思辨的距離，回想起先前曾有過的種種猜測，又不禁發覺更多紛至沓來的聯想，餘波盪漾。

<sup>72</sup> 培瑞克在此利用無可定位且變幻莫測的疏離聲音作為陳述活動主體。關於這種無名無形的「殘酷」執法者的修辭研究，請參見 Claude Burgelin 分析精闢的論文：“Perc et la cruauté” (Burgelin, 1985)，以及同一作者的專書 *Georges Perec* (Burgelin, 1988)。

<sup>73</sup> W 島上可聽聞的是教練發號司令的簡短命令句 (如頁 210、217-218)；相對的，島上運動員不曾發聲：我們從未聽見他們以個體或群體之名發言，表達任何的感受和意見。

<sup>74</sup> 也許這一切顯得很誇張、不可思議，但是令人震驚的是，真實存在的集中營其慘絕人寰，與 W 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W 島並未施行種族滅絕行動)。

## 柒、結語

歷史不像喬叻思 (James Joyce) 所言的，並非只是「一場我拚命從中醒來的惡夢」，我們根本沒有別的命可活。(Perec, 1992: 112)

最後，筆者延伸前面所述，提出三點感想，作為結語。首先，延續前一章的風格問題，就 W 島寓言的殘酷美學來看，其書寫所欲經營和預期的讀者接受效果，與 W 島內部集中營式空間所欲加諸於人的存在狀態，在「構成」上是緊密吻合的。培瑞克在《W 或童年回憶》的結尾，引胡瑟的文字，歸結「集中營的構成」是：以不斷地操練來耗損俘虜的體力，作為一種無止無盡且毫無意義的刑罰：「不作工，光『運動』，加上不像樣的飲食」(Perec, 1975: 221)，完全是身體管訓的問題。培瑞克在談翁恬的集中營經驗時，也曾如此描寫那漸進累積的折磨：「集中營不是一下子就讓你領教的，而是強迫你去體驗，慢慢浮現的：是泥淖，再來是饑餓，再來是寒冷，再來是挨打，再饑餓，再一次又一次，還有蟲子……」(Perec, 1992: 96)。而蕭萌 (Jean-Michel Chaumont) 研究集中營俘虜身體的論文中也指出，集中營的邏輯是把人貶低到最低限的存在狀態：「出於一種僅是表面看來的弔詭 (似非而是的真理)，人僅剩下存活功能，被極端簡化的身體，就變成了一個陌生 (就其最普通的字面意義而言) 的身體 (……)，『我是一個身體』，甚至說不上『我是我的身體』」(Chaumont, 1992: 303)！換言之，人不只喪盡人本尊嚴，更落入了一種為了本能求生而無法自控的異化境地。相對應的，培瑞克在 W 島所嘗試的仿說明文式書寫，仿若揣摩並重建此一漸進的、極盡的、剝削至筋骨的進程。但起初看來 (即初入 W 島時)，卻是神不知鬼不覺，藉著無以指認的第三者 (無名者) 陳述，平和地、

熱心地、理性地為初到者作導覽；以近於維爾納教科書式的嚴謹筆調，以實證的觀點和擬客觀的立場為掩護，「娓娓道來」，集盡所有可能的細節發展，致使書寫本身最終也感染了麻木不仁的「殘酷」。

其次，培瑞克以虛構傳奇的迂迴手法，將他自己無知年少時代所曾幻想出來的故事，擴展成足以穿透今昔時空的一個歷史寓言模型，不僅達到他欲喚醒關懷歷史的意識，也在其中透露了他所一直無以明言的，刻印在他生命中的初始創傷。弔詭的是，這道創傷未曾經歷，卻已內化。從幻想故事到歷史寓言，那既從內含有，又從外包覆的意象，使得這部另類的自傳展現為一種怪圈式（或莫比斯圈 [Bande de Moebius]）的時空感知觀點，裡外翻轉繞行合一。培瑞克身為歷經二次大戰長大的孩子，在他的記憶工作中，許多親身經歷或未曾經歷的事，個人的生活與歷史事件，彷彿是以一種碎塊散落的方式並現，在萬花筒的旋轉之中，組成了隨意的圖像。舉一個他不只一回提到的例子：「正巧」就在一九三六柏林奧運那年，培瑞克於巴黎出生。他曾在日記中寫道：在長久的日子裡，他一直誤以為希特勒是在他生日的那一年、那一天（三月七日），攻進波蘭的：波蘭，是他不曾認識的地方，他的父母所來自的故鄉，也是他的母親被送往的集中營所在地，可能也是在她去世前，最後一瞥的家鄉。然而，這些事件原本是各自分開的，卻從不同的方向而來，意外地交會，直至纏根錯結：長年之間，培瑞克對於史實莫名的誤解，或許正暗示他一直默默承受著未曾親身經歷的那段歷史的後果：冥冥中他似乎感覺這一切如何串連成他的命運圖像，<sup>75</sup> 也是整

<sup>75</sup> 此一說法首先出現於〈我出生〉（“Je suis né”）一文，原為培瑞克的私人日記片段，現收錄於同名短篇作品集 *Je suis né*，頁 12 (Perec, 1990)。其後也引入《W 或童年回憶》頁 35 (Perec, 1975)。值得注意的是培瑞克雖在政治立場上偏左翼思想，但

本自傳至終留予讀者的一幅生命圖像——如何能不寫集中營而寫出他的故事！？

運動島的想像，原本只是少年個人的幻想遊戲，但是卻成為多向反射的凝聚性象徵，穿越百年時空，形成一則寓言，暗指西方理性文明社會畸形發展下的產物，而其控管的對象是每個人的身體、社會中的所有人。因此，——作為結語的第三點**額外**感想——從諸多方面來看，這部自傳裡深刻觸及的已是屬於傅科 (Michel Foucault) 所言的生命政治議題，而運動和體育之提倡，正是其中極具重要性的一環。本論文以運動的特定主題為中心，探究蘊生這部自傳的時空框架，回溯約莫百年間的法國運動發展與政治歷史的緊密關聯，一方面具體彙整一些重要的史實事例以及相關的意識形態，一方面用以銜接、映證 W 島故事中描述的相關片段。雖然筆者無法在本論文有限的篇幅之內，更進一步經由生命政治理論來完整闡述，但是從探討 W 如何以一則虛構寓言置入自傳結構的意義，筆者深有感觸，認為一個可以留待日後發展的理論性議題，將是現代文明中，生命書寫與生命政治交結重疊關係的研究；或者說，生命政治或許是現代生命書寫難以規避的一種條件情境、一種觀點、一種詮釋方法；而那時，生命書寫，將不再是僅以對普遍人類命運作形上學哲思的結論就可滿足了。

---

是他在自傳中所呈顯的歷史觀卻並非唯物史觀的直線單向發展。

## 參考文獻

- 許綺玲 (2007)。〈「被判處的家門」：培瑞克的《地點》記憶存檔〉，  
《外國語文研究》，5: 35-58。(Hsu, C.-L. [2007]. “La porte-  
condamnéé”: Georges Perec’s *Lieux/Places* as memorial archiv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y*, 5: 35-58)
- 鹿島茂 (2005)。《巴黎時間旅行》(吳怡文譯)。台北：城邦文化。(原  
文初版 1993 年) (Kashima, S. [2005]. *Travel through time in  
Paris* [I. W. Wu, Trans.]. Taipei: City Cultur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3])
- 盧卡奇 (1997)。《理性的毀滅》(王玖興等譯)。濟南，中國：山東人  
民出版社。(原文初版 1954 年) (Lukács, G. [1997]. *The destruc-  
tion of reason* [J. S. Wang, Trans.]. Zinan, China: Sandong Peo-  
ple’s Publicati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4])
- Agamben, G. (1998). *Image et mémoire*. Paris: Hoébeke.
- Barthes, R. (1984). *Le bruissement de la langue*. Paris: Seuil.
- Beumatin, E. (Ed.). (2003). *Cahiers Georges Perec: No. 7. Antibiotiques*.  
Bordeaux, France: Le Castor Astral.
- Béhar, S. (1995). *Romance languages and littérature: No. 28. Georges  
Perec: Écrire pour ne pas dire*. New York: Peter Lang.
- Bellos, D. (1994). *Georges Perec, une vie dans les mots*. Paris: Seuil.
- Bertelli, D. (2003). *Entretiens et conférences, Vol. 1: 1965-1978*. Paris:  
Joseph K.
- Burgelin, C. (1985). Perec et la cruauté. In B. Magné (Ed.), *Cahiers  
Georges Perec: No. 1. Colloque de Cerisy juillet 1984* (pp. 31-52).  
Paris: P.O.L.
- Burgelin, C. (1988). *Georges Perec*. Paris: Seuil.
- Chaumont, J-M. (1992). Le corps du concentrationnaire: La honte et  
le regard. In J.-C. Gooddard & M. Labrune (Eds.), *Le corps* (pp.  
290-309). Paris: Integrale/Vrin.
- Dana, C. (1998). *Fictions pour mémoire: Camus, Perec et l’écriture de  
la Shoah*. Paris: L’Harmattan.
- Didi-Huberman, G. (2000). Connaissance par le kaleidoscope. Morale  
du joujou et dialectique de l’image selon Walter Benjamin.  
*Etudes Photographiques*, 7, May: 4-27.

- Gillet, B. (1967). Historique des Jeux Olympiques. In R. Caillois (Ed.), *Jeux et sports* (pp. 1185-1218). Paris: Gallimard.
- Giolitto, P. (1991). *Histoire de la jeunesse sous Vichy*. Paris: Librairie Académique Perrin.
- Guillon, J.-M. (1992).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nationale. In J.-P. Azema & F. Bedaria (Eds.), *Le régime de Vichy et les Français* (pp. 167-183).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 Hartje, H. (2000). *W* et l'histoire d'une enfance en France. *Etudes Romanes*, 46: 53-66.
- Jantzen, R. (1992). *Sport et sacré*. Bordeaux, Fra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Bordeaux.
- Lecarme, J. (1993). La page des sports. *Magazine Littéraire*, 316: 40-42.
- Lejeune, P. (1991). *La Mémoire et l'oblique*. Paris: P.O.L.
- Lejeune, P. (1998). *L'Autobiographie en France*. Paris: Armand Colin.
- Lejeune, P. (2003). La rédaction finale de *W ou le souvenir d'enfance*. *Poétique*, 133, February: 73-106.
- Magné, B. (1988). Les sutures dans *W ou le souvenir d'enfance*. In H. Hartje (Ed.), *Cahier Georges Perec, No. 2. W ou le souvenir d'enfance: Une fiction, séminaire 1986-87* (pp. 39-55). Paris: U.E.R. Sciences des Textes et documents, Le Conseil scientifique de l'Université Paris VII.
- Magné, B. (1999). *Georges Perec*. Paris: Nathan/HER.
- Morgan, W. (1994). *Leftist theories of sport: A critical and reconstruction*. Urbana, IL. &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Pecout, C. (2007). *Les Chantiers de la Jeunesse et la revitalisation physique et morale de la jeunesse française (1940-1944)*. Paris: L'Harmattan.
- Perec, G. (1975). *W ou le souvenir d'enfance*. Paris: Denoël.
- Perec, G. (1990). *Je suis né*. Paris: Seuil.
- Perec, G. (1992). Robert Antelme ou la vérité de la littérature. In M. Olender (Ed.), *L. G. Une aventure dans les années soixantes* (pp. 87-114). Paris: Seuil.
- Perec, G. (1995). *Récit d'Ellis island*. Paris: P.O.L.
- Queysanne, B. (Director). (1999). *Georges (...) Perec: Propos amicaux*



- à propos d'espèce d'espace*. Paris: La Sept Arts.
- Roche, A. (1997). *Georges Perec W ou le souvenir d'enfance*. Paris: Gallimard.
- Rousset, D. (1965). *L'Univers concentrationnaire*. Paris: De Minuit.
- Sontag, S. (1983). Fascinating fascism. In E. Hardwick (Ed.), *A Susan Sontag reader* (pp. 305-325).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Books.
- Vierne, S. (1973). I, Une oeuvre mûrie dans une période troublée. In S. Vierne (Ed.), *L'île mystérieuse* de Jules Verne (pp. 1-28). Paris: Hachette.
- Le sport, la violence dans *W* et *Rollerball*. In J.-F. Chassay (Ed.), *Cahier Georges Perec, No. 8. Colloque de Montréal* (pp. 85-92). Bordeaux, France: Le Castor Astral.

## “W” Island as a Sport Fable and/or the Childhood Recollection

*Chi-Lin Hsu*

French Department,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No. 300, Jhongda Rd., Jhongli City, Taoyuan County 32001, Taiwan  
E-mail: severina@cc.ncu.edu.tw

### Abstract

Georges Perec was a French Jewish writer (1936-1982). His father was killed in battle at the beginning of World War II. His mother was arrested, and probably died while being deported to a concentration camp. As a little child, Perec found refuge in Vichy France. In 1975, he published *W or the Childhood Recollection!* to retrace his childhood. Structurally, this unusual autobiography contains a double axis of stories, telling his broken impressions of child's life as well as an adventure fiction about a legendary W island where sport is responsible for making all of the rules. We will first consider the status of this work to see how it transgresses the limits of defined “genres,” such as autobiography, deportation literature and *mémoires*. Then we will explain how the sport allegory functions as an inextricable element of the history that our young hero lived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rough a diversity of discourses around sport, the fable of W refers to several historical events and their related ideologies. The author relied on sociological theory debates flourishing in the 1960's to reconstruct his personal story, which it is impossible to dissociate from the history.

**Key Words:** recollection, autobiography, Second World War, concentration camp, sport